

最後的一些疑問 / 瞿海源*

本來在 2008 年屆齡時就打算退休，但因為協助執行一些集體研究計劃，就延緩下來。不過從 2007 年到荷蘭萊登大學講學時，就已經有退休的念頭，不時會回顧一下近四十年的學術研究生涯。有時也會對三十年來國內社會學的發展有一些感想，有幾個疑問乃至疑惑不斷浮現心頭。

第一個疑問是，社會學博士的數量從 1970 年代末到 2000 年代末三十年間，從十人不到增加到三百多人，可是為什麼兩個主要社會學期刊的論文稿量並沒有成比例增加？稿量不多，能通過審稿刊出的更是少數。社會學者的學術研究產量好像有問題，而期刊編輯過程可能也有狀況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社會學年會提論文的數量，近幾年來每次都超過 100 篇，逼近 150 篇，比 1996 年剛開始舉辦年會時的 48 篇多了近兩倍。似乎學術研究產量也還可以，為什麼論文不能出版或出版不了？

第二個疑問是關於質化和量化研究之爭。自 1980 年起，有一些社會學者開始質疑量化研究，到了 1990 年代，有更多的年輕學者從事質性研究，到了 2000 年代，量化研究幾乎可以說為多數年輕社會學者所排斥。從事質性研究者也多習慣在論文中先批判量化研究方法，再來強調自己質性研究的優越性。質化研究和量化研究幾乎變成水火不容，其實這種鬩牆之爭並無意義，也多少妨礙了社會學研究的發展。質性研究的質量並不理想，而量化研究面臨後繼無人的斷層現象，都是台灣社會學的危機。

第三個問題是理論的問題。國內有些社會學者聲稱自己是研究理論的，不做實證研究，自己也不去建構理論，多半是理論的洋代辦。他們在研究社會學，而不研究社會。另外有一些學者把理論和研究資料編織乃至混合成一體，資料已經溶入了論述，或者可以說把資料藏到論述裡去，讓人無法辨識資料，更不能判定資料的真偽和可信程度。有更多的研究者習慣做形式的理論回顧，而實際論述多半又不能扣緊理論。大體上，大家多在套用理論，上焉者在做理論的小註腳，下焉者只在形式上搭上一點理論。於是，社會學者多半喪失了社會想像力。

最後一個問題是，研究議題多為微視，少有鉅視的研究。幾乎沒有社會學者對台灣社會變遷中的重要鉅視現象從事研究。例如，對整體社會變遷、對大型企業集團如何影響社會發展、乃至重大社會問題，社會學者都沒什麼研究。對台灣社會的重大變遷和重大問題，社會學者多半提不出什麼獨特的學術見解。

這四個疑問可說是台灣社會學研究面臨的問題。對我而言，這些疑問其實也可以說是疑惑，也提不出什麼解決之道。寄望比我年輕的社會學者，面對問題，共同尋求解決之道。

*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